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八四期 ——
(二〇〇七年七月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707a)

【回首文革】十年一梦——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文革回忆录 (节选一) 徐景贤
【文革祭坛】千古伤心文字狱——邓拓逝世 40 年祭 袁 鹰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回首文革】

十年一梦——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文革回忆录 (节选一)

• 徐景贤 •

◇ 文革序曲

一九六六年岁末，严寒的冬天悄无声息地来到了人间。

然而，我却仿佛没有感觉到冬天的降临。刺骨的风，寒彻的雪，似乎都在我那炽烈的热情面前消散了，融化了。因为，这一年的十二月十八日，由我担任党支部书记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正式发表“造反声明”；我在造反大会上以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作了题为《造反才知主席亲》的长篇发言，宣布造上海市委的反。这就是当时上海的各家造反报纸所报道的：“市委心脏爆炸，曹家后院起火！”曹家，指当时主持上海市工作的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从此，我就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之中。

我公开宣布造反，在上海市委机关干部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机关纪律严明，规定任何情况不得外泄，更不用说是知情人起来造反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个人的原因。我解放初期就到市委机关工作，当时还只有十七周岁。我在市委工作的十五个年头里市委先后换了三届第一书记：陈毅、柯庆施和陈丕显，我都没有离开过市委。我在市委机关裹有不少熟人，他们都叫我“小徐”。在宣传部文艺处，我当过干事，副科长，以后又担任市

委写作班支部书记，并被任命为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列席市委常委会。我了解机关的内情，也受到领导的重用，所以，当我起来“反戈一击”的时候，有些领导大惊失色，各部、委、办的造反派起而呼应，也有些人表示不满和反对，整个市委机关乱了套。

◇ 我的经历

我从一个青年学生成长为一个党的干部，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培养的结果。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我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里。父亲徐宗骏，是上海郊区奉贤县一个小商人的儿子，一九二六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化学系，同年回到奉贤。一九二七年秋和共产党人李主一、刘晓等创办了一所曙光中学，他任校长；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学校被国民党查封，父亲逃往上海，从此脱党，他先在中学教书，以后在交通大学化学系任教，从助教而讲师而副教授。我的母亲戴秋楠，原来是小学教员，国共两党合作时期担任过奉贤县国民党县党部委员，以后成为家庭妇女，养育了我们姐弟三人。我在家裏排行老二。

我的童年时期和少年时期是在上海交通大学附近的一条石库门弄堂裏度过的。我就读于学费昂贵的南洋模范中小学，因为父亲在中学部兼课，可以减免我的一半学费，如果成绩优秀的话，还可以减免另一半学费，所以我读书时经常名列前茅。从小学到中学，我经历了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法租界的痛苦生活，因为日军进驻交通大学改为同文书院，父亲愤而辞职，家境日见窘困，我也排队买过户口米，吃过六谷粉，培养了仇恨帝国主义侵略的强烈的民族感情。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父亲复员回到了交通大学教书，我在交大学生的影响下和中学同学一起参加了一些反美反蒋的学生运动，担任过平民夜校的教师，接受了进步思想。在中学裏我参加了学生自治会的竞选，担任学艺部长。

上海的解放给我带来了参与各项政治活动的广阔天地，我在学校里第一批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又成为南模通讯组的组长，向报纸杂志投稿。一九五一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违背了父亲希望我成为化学家的意愿，撕掉了大学入学报名表，报名参加了上海市政建设干部训练班。组织部门在选拔时，了解到我爱好写作，写过一些文章，竟然直接把我分配到市委宣传部工作。以一个普通的中学生，能够被选送到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工作，对我来说，实在是莫大的殊荣。从此，我开始了在市委机关工作的漫长生涯。

一九五三年四月，我经丁景唐和徐啸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时，结识了同事葛蕴芳，她解放前在上海市立女师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夏衍的第一任秘书。我们于一九五六年结婚，婚后有两个女儿，建立了温馨的家庭。

我在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开始时分工联系群众文艺，以后又联系文艺界。我在工作岗位上继续自己的学业，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函授学习，同时，继续从事业余写作，在报刊上发表文学评论，杂文、散文、影评，书评等。我写过以解放前夕上海学生运动为题材的传记文学《党的儿子穆汉祥》，电影剧本《曙光在前》（与人合作），出版过散文、报告文学集《生命似火》；我参与创作的话剧《年青的一代》，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创作奖，并被搬上了银幕。一九五九年，我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会员；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〇年，我两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一九六五年，我作为青年作家的代表，访问战火纷飞的越南，受到了胡志明主席的接见。

我的这些经历，为我被调到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并受到重用，创造了条件。

◇ 上海市委写作班——文化大革命的舆论策源地

一九六三年，中共上海市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要加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决定从各方面调集人员，成立一个专门的写作班子，负责撰写各个领域的大批判文章。市委写作班刚建立时，由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分管，把我从市委宣传部文艺处调去，担任市委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市委写作班的地点设在上海华山路丁香花园，传说是李鸿章为他的妾建造的一座大花园。写作班下设文学组，主要笔名是“丁学雷”，寓丁香花园学习雷锋之意，由我负责历史组的主要笔名是“罗思鼎”，寓“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之意。开始时由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金冲及负责，金冲及随石西民调去北京以后，改由朱永嘉负责；此外，还有哲学组、自然辩证法组等。写作班的成员都是从社会科学各部门，各单位，各大专院校，各文艺协会、院团以及市委党校等处调集的，都是较强的“笔杆子”，都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谁要是进了市委写作班，那就是一名受党信用的“左派”，在当时是十分光荣的事。

一九六四年，石西民调去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写作班改由市委书记张春桥分管。张春桥是我的老上级，在市委文艺工作部和市委宣传部，都当过我的领导。一九六六年张春桥调到中央文革小组任副组长以后，上海市委写作班又由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负责。无论是石西民，张春桥或是杨西光，他们对写作班都抓得很紧，向我们传达中央的有关指示，部署一个又一个的战役，审查一个又一个的选题计划，直至审改一篇又一篇的重点文章。在他们的领导下，市委写作班在各条战线上主动出击，展开了全面的大批判：

在哲学方面，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

在历史方面，批判了忠王李秀成的“自白书”、影片《清官秘史》的历史观；

在文学方面，批判了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四条汉子”所代表的“三十年代文艺黑线”，批判了“国防文学”口号和“中间人物”论；在电影方面，批判了《中国电影发展史》和瞿白音的《“创新”独白》，批判了影片《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林家铺子》、《舞台姐妹》……在戏剧方面，批判了“有鬼无害”论，批判了孟超的《李慧娘》、田汉的《谢瑶环》……

总之，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还没有揭开，在思想战线上早已是炮火连天，硝烟弥漫了。当然，关键性的战役就是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批判。一九六五年初，江青经过毛泽东的批准，在上海通过张春桥找到了姚文元，下达了撰写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的任务。江青强调写这篇文章要“保密”，姚文元就躲到了我们市委写作班来。当时写作班已经搬到武康路二号，张春桥亲自向我们宣布了保密纪律，由朱永嘉任组长的“罗思鼎”小组为张春桥和姚文元收集、整理明史资料。

早在一九五四年，我在讨论工人文学创作的座谈会上就结识了姚文元。此后，我们之间有着较多的交往，所以对于他的来到写作班，我作了妥善的安排，替他在武康路二号的二楼辟了一间专门的写作室。《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写了八个月，写到第十稿，由毛泽东亲自审定，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题，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发表于上海《文汇报》，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由此也立了功，后来受到过江青的公开表扬。

一九六六年，张春桥和姚文元先后被调去北京，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和组员。上海市委任命我和朱永嘉任上海市委文革小组成员，替市委到处“救火”。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以后，我不想再为市委效劳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朱永嘉被上海市委派到上海驻北京办事处去“摸气候”，张春桥和姚文元接见了，要他带口信给我，告诉我上海市委在一九六六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执行了错误路线，要我带领市委写作班的成员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站

在一起。过了几天，姚文元又和我通电话，问我“是写文章，还是上第一线”？意思很清楚：张，姚让我放下工作上“前线”，是要我和上海市委划清界线，带头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

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因病住在西郊，市委书记兼市长曹荻秋主持日常工作，苦于应付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炮轰”，他要我代他起草向中央和群众作的“检查”，还让我列席市委常委会，使我了解了许多内情。于是，我在十二月十八日的市委写作班造反大会上当众作了揭发，并勒令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 and 市委常委常溪萍等人到会听取批判。我们的口号是：“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我们的行动，开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内部造反的先河。

我带头造反，“揭竿而起”以后，市委机关内部的造反派纷纷杀将出来，我们又成立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简称）以及各个红卫兵组织联合起来，继续向已经基本上陷于瘫痪的上海市委和市政府进攻。

那年冬天，我甚至连自己的三十三岁生日都忘记得一干二净。每天每日，我骑着自行车，以市委联络站负责人的名义，往来奔忙于上海各个造反大会的会场之间。每到一处地方，我就从头上摘下那顶哥萨克式的皮帽子，解开对襟的中式棉袄，满头冒着热气，慷慨激昂地发表一通演说，然后匆忙地赶往下一站。在我看来，这真是一个火热的冬天啊！

◇ 姚文元打来电话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那天下午，我们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成员们昨天刚刚吃过为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祝寿的长寿面，大家聚集在武康路二号的草坪上，商量着怎么进一步揭发批判市委的问题。忽然，文学组的一个青年从楼裏奔出来叫我：“老徐，北京有长途电话！”我赶紧跑到办公室，拿起电话听筒，里面响起了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夹杂着上海口音和浙江口音的普通话：

“徐景贤吗？我是姚文元啊！今天要向你传达一下主席的指示……”

哦，原来是文元。自从他调到北京去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员以后，几个月来，总是我有事打电话找他，他从来没有主动给我打过电话特别是在市委写作班子宣布造反的前后，我频频向北京打电话，寻求他和张春桥的支持，很想倾听他的意见。但是，电话相当难打，连通过红色保密机也难以找到他，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当时，我心裏曾经多次嘀咕：“老朋友也搭起架子来了！”今天，他忽然主动打电话给我，而且要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真使我喜出望外。我赶紧掏出小本子准备记录。

姚文元在电话裏一反平常冷静的语调，用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语气说道：

“昨天晚上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都到毛主席那里去了，祝贺主席生日，给主席敬酒。主席很高兴，他平时很少喝酒的，昨天和我们干杯了。主席对上海的形势很关心，他从中央文革的《快报》上看到了你们造反的消息。主席说：上海的形势很好。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现在机关干部也起来了。我问主席：上海市委强调‘内外有别’怎么办？主席说：‘内外有别’可以打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很重要，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

我一边听，一边嗯嗯，把姚文元电话传达的内容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心裏激动得热血沸腾。

姚文元接著说：“主席很欣赏你们的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他说‘火烧’、‘揪出’，‘打倒’，‘砸烂’，这几个口号的提法有区别，好！”

姚文元最后说道：“主席在和我们碰杯的时候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这一期《红旗》杂志将要根据主席的指示发表元旦社论，你们要很好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我问姚文元：“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可不可以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范围内开会传达？”

姚文元沉吟了一下，说：“不要开大会，你们先在小范围例吹吹风吧。我放下电话，兴奋万状，奔到写作班的草坪上，逢人便说：“刚才文元同志来电话了！文元同志向我们传达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了！”我想我宣布造反的时候，虽然有张春桥和姚文元做后盾，但心里还是不很踏实的，现在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为我们撑腰了，我还怕什么？！晚上，在武康路二号写作班二楼的玻璃阳台上，由我主持开了一个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骨干会议。会上先由我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紧接着哲学组、历史组，文学组以及市委办公厅《支部生活》编辑部的人员纷纷争着发言，有的噙着眼泪，有的庄严宣誓，大家的神情异常忠诚、肃穆。

在讨论中，我提醒与会者思考“毛主席说的全国全面内战开始了，究竟有什么样的深刻含义？我们该怎么做？”

胖墩墩的朱永嘉说：“我们市委联络站比其他造反组织条件优越得多，我们要利用这些条件继续开大会批市委。”

从复旦大学哲学系调到市委写作班哲学组来的郭仁杰，操着山东口音说“毛主席不是说‘内外有别’可以打破吗？我们把市委档案室里的档案翻出来，把有关内容摘录下来，作为批判市委执行反动路线的炮弹。”

我觉得这些主意不错，表态说：“可以，由我写条子给市委书记马天水批，过几天组织几个党员进市委档案室查档案。这次批判市委的大会要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为口径，由我们负责写出发言稿，大会要和‘工总司’，‘农司（筹）’，‘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的简称）等组织联合召开，声势要大一点。大会由党校来的程绮华负责筹备，筹备处就设在淮海中路市委党校……”

一切商量定当以后，夜已深了，我们对着毛主席的画像，轻声唱起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支歌。我边唱歌，边感到自己的身心激动得颤抖起来：这场全国全面内战的结果是什么，我还不能预计。但是，我预感到自己将成为一场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在即将到来的全国全面内战当中，我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一边……

唱着、唱着，我蓦然想起了复旦大学的红卫兵在我造反以后送给我的一副对联：

革命方觉北京近，
造反才知主席亲。

今天，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这个“亲”字，我把这个“亲”字真正地溶入到这首歌曲里去了。

我们唱得很轻、很轻，歌声只在室内回荡，因为就在市委写作班隔壁的一幢楼里，还住着

一个市委书记和一个部长。时过中夜，他们家裏黑洞洞的，人们早已进入了梦乡。我们不想惊动他们。当然，在沉睡中的他们，也万万不会想到：就从近在咫尺的市委写作班裏，一场席卷全国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风暴，即将猛烈地刮起来了！

◇ 上海大乱

正当我们沉浸在接获“最高指示”的胜利喜悦中的时候，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傍晚，我得到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的紧急报告，说是上海工人赤卫队有几万人包围了康平路市委大院。

这个消息太出人意料了，因为上海工人赤卫队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成立的时候，是公开反对张春桥支持的“上总司”的，对上海市委一直持“保”的态度，所以被骂为“保皇派”，现在怎么也“造反”了呢？

我了解了一下，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十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工人赤卫队在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召开大会，要求曹荻秋市长到会，提出了与“工总司”相对立的八项要求，让曹荻秋市长签字，曹开始时加以拒绝，赤卫队就批斗个没完没了，一直纠缠到次日凌晨三点钟，硬要曹市长承认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曹市长又急又晕，曾经昏厥过去，最后只得签字。第二天，上海市委开会时，陈丕显第一书记批评曹市长不应该签这个字，要曹给赤卫队做做工作，妥善解决这个问题。赤卫队的工作还没有做通，十二月二十五日，“工总司”又在人民广场召开批判大会，勒令曹市长到场，迫使他当众宣布：给赤卫队签过字的八条作废，赤卫队是“保皇组织”。

◇ 上海的第一场大武斗

这样一来，矛盾激化了，赤卫队被激怒了，把怒气出到上海市委头上。赤卫队总部一方面给党中央发电报，要求派专人来上海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从十二月二十七日起，调大批队伍包围了康平路上海市委书记处，要找陈丕显、曹荻秋算账。陈丕显、曹荻秋没有接见他们，赤卫队就继续调兵遣将。到十二月二十八日，已经有两万多名赤卫队员涌进了市委大院，还有很多人拥塞在大院外的马路上。

在这种急剧变化的局势面前，我决定亲自到现场去走一遭，观察形势，再商量对策。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我手持市委机关工作证，挤过层层包围圈，进入了康平路市委大院。我在大院里到处走动，实地观察。天气很冷，我戴上了一个大口罩，防止被人认出来。我走进市委书记处的办公楼。只见到处挤满了人，每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裏，至少挤进几十个人，连不到三平方米的小厕所里，也挤着四、五个人。楼梯头、走廊边、草坪上，树荫下，满坑满谷；全是戴着“赤卫队”红袖章的工人。

原来住在康平路大院裏的市委领导人，已经撤走了；连一向声称自己不害怕群众的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也带着家属转移了。整个大院裏只剩下已故的原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家属以及张春桥的一家。赤卫队的头头们进入康平路大院之后，到过张春桥的家里，要求张的妻子李文静为他们向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反映赤卫队的要求，随后就退了出来。柯庆施和张春桥的家属，都是安全的。我找到位于大院中部公寓里的张春桥的家。从后面的那座水泥楼梯悄悄地绕道走上去，走到张家的后门口，从玻璃门朝里张望，客厅里不见人影；我试着敲敲后窗，轻轻喊了几声，也没有人答应，估计李文静和孩子们因为害怕，都躲到内室去了。

我再返回到大院裏，观察动静；只见赤卫队员们因为总部提出的要求得不到满足，见不到陈丕显和曹荻秋，情绪十分低落，有的人用毛笔在墙上写大标语：“曹老头决没有好下场！”“赤

卫队要大造上海市委的反！”发泄自己的不满。在现场看不到有人在作宣传鼓动，加上队员们通宵集合包围市委，大家根本没有休息，现在许多人就席地而坐，背靠着背，脸上显露出十分疲惫的神色。有几个工厂的食堂，用黄鱼车给本厂的工人送饭菜来，吃剩的饭菜，连同写着各个工厂厂名的搪瓷盆碗，到处乱扔，满地狼藉；还有的单位送来几百箱饼干，高高地堆在空地上；看到这些情景，我的心里暗暗高兴，我想：市委这下子彻底被动和孤立了；因为把两派群众都得罪了。我觉得现在正是从政治上瓦解工人赤卫队的最好时机。

正当我兴冲冲地走出康平路市委大院的时候，忽然看见有许多打着红旗的队伍，从徐家汇、宛平路、余庆路等方向向康平路涌来，红旗上印着醒目的黄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人造反队”，他们迅速把康平路大院从四面八方包围了起来。我上前一问，回说队伍是“工总司”二兵团调来的，有的人还说什么“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我们是来保卫中央文革的”！这时，在康平路大院门口，两支观点不同的队伍对峙着，互不相让，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我马上回到市委写作班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我说：“‘工总司’这种做法真蠢，康平路市委大院现在是一座空城，让赤卫队呆在那里，没有几天就会溃散的。现在二兵团调了大批队伍去包围；反而刺激了赤卫队的情绪，弄得不好，可能要出事。”

历史组的朱永嘉说：“我们还是把重点放在准备召开全市的批判大会上，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来，让康平路去唱‘空城计’，不要睬它。”哲学组的郭仁杰说：“赶快想办法找找‘工总司’和二兵团的头头王洪文，潘国平和耿金章，要他们把队伍撤走。”

于是，我要市委写作班的机要秘书打电话找王洪文他们，可是到处找不到。我说：“这样对峙下去，双方很可能要大打出手，如果出了人命案子，造反派就被动了。我们还是搞文的，要大家把矛头对准市委，从政治上瓦解赤卫队。”

我马上通知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在康平路大院边缘上的一百八十一号楼里，设立一个联络点；要党刊《支部生活》编辑部造反队负责，在康平路大院四周高楼上，安装起几只高音喇叭。我布置历史组、文学组的几支笔杆子，立刻起草传单；我自己也亲自撰写了一份《赤卫队为什么要大闹龙宫？》，呼吁赤卫队员们反戈一击，杀回工厂去，向市委的反动路线猛烈开火。传单写好后立刻被打印出来，还抄成大字报，在康平路大院周围散发和张贴，并且通过高音喇叭连续向大院内广播。经过政治攻势之后，有一批赤卫队员取下自己的袖章，偷偷从人缝里溜走了，留在大院裏坚持不走，被包围着的还剩一万多人。

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上，一些愤怒的赤卫队员把怒火倾泻到市委头上，在康平路大院里刷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标语。张春桥的妻子李文静从康平路连夜给正在北京的张春桥通了电话。二十九日早上，市委写作班的红色保密电话机铃声响了，我拿起听筒，是李文静打来的，她说：“昨天半夜里我和春桥通了电话，讲了康平路大院里的情况，春桥说：现在赤卫队造了曹荻秋的反，提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口号。要告诉徐景贤转告上海各个造反组织注意，不要让赤卫队把胜利果实夺走了！”

接到张春桥的电话以后，我向市委机关联络站的人员作了传达，并且和几个领导核心商量如何落实张春桥的指示。我说：“春桥同志的提醒很重要，不然我们造的反，让赤卫队摘了果子，岂不前功尽弃？我们召开大会的口号看来要升级了，不能再用‘火烧’、‘揪出’等提法，一定要提‘打倒’。大会一过年就开，口径要统一，按春桥同志的电话指示精神，正式喊出：‘打倒陈、曹！打倒上海市委！’”

当天晚上，在紧挨着康平路大院的荣昌路六十号临时指挥部裏，我派出的王承龙、朱维锋

和“工总司”二兵团的司令耿金章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耿金章在知道了张春桥的来电以后，不愿用“文攻”，继续增调大批工人造反队，急于指挥他们打进去。半夜过后，耿金章不听劝阻、一声令下，工人造反队发起了冲锋，蜂拥进入市委大院，边冲边打，把疲劳过度、毫无斗志的赤卫队员们打得落花流水，有的人还被从二楼阳台上推下楼去，摔成重伤。赤卫队员们被俘虏以后，排成长长的单列纵队，鱼贯走出康平路市委的大门。所有的人都被当场剥去赤卫队的袖章，高举双手作出投降的姿势，每个人的手里还要拿一根稻草，表示到市委来“捞稻草”的意思，然后排成六路到四周的马路上集中，听取训话后才被释放回家。

耿金章他们打胜以后便扬长而去，留下的伤员只好由市委大院裹的后勤工作人员集中处理，清点下来受伤的共计九十一人，其中最严重的被打断腿骨，于是当即叫来救护车把伤员分别送往华山医院、瑞金医院和华东医院救治。

等到清点处理完伤员，已经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凌晨一点半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唉，总算没有打死人，不然造反派政治上很被动，怎么向春桥同志交代呢？”

这场万人大武斗，在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武斗结束以后不到半小时，张春桥从北京亲自打电话给我，向我详细询问了武斗的情况，我一一作了汇报。

张春桥听完汇报，用他那由于抽烟过度而显得有些沙哑的嗓音，斩钉截铁地说：“你们一定要始终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大造舆论，大造声势。指明这场武斗完全是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引起的，他们才是这次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临了，他又说：“再也不要提‘赤卫队抄张春桥的家’了！”

我回答“我知道啦！最近几天，我们准备集中全力，召开一次‘打倒上海市委’的大会，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 周总理下令抓赤卫队头目

工人赤卫队挨了一顿打，当然是不肯善罢甘休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赤卫队的一些头头鼓动了一批队员、冲进了上海北火车站，准备仿照王洪文、潘国平等人在“安亭事件”中的做法，乘火车上北京请愿、告状去。提起“安亭事件”，人们记忆犹新，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下午，王洪文联合各厂的工人造反队，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宣布“工总司”正式成立，因为上海市委采取“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方针，王洪文、潘国平等会后就串连两千多人到市委请愿，市委负责人拒不接见，他们就到北站搭火车北上请愿。火车开到嘉定县安亭车站时，被阻在支线上不能前进，工人造反队索性在沪宁线上静坐，造成铁路交通中断三十小时又三十四分钟。这件事震动了中央文革，先是陈伯达发来电报，接着张春桥又受命从北京飞来谈判，最后同意了“工总司”的要求，沪宁线才恢复交通。现在，赤卫队就提出：“工总司”可以乘火车上北京请愿去，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呢？

我对赤卫队的做法很反感，我想由他们去闹吧，反正上海市委自食其果、他们总会向中央报告的；而我已经有几天几夜没有好好睡觉了。趁着过除夕夜的机会，我回到常熟路瑞华公寓自己家裏，早早地上了床。

当我正在沉沉熟睡的时候，床边的电话铃急骤地响起来。我抓起听筒，传来的是长途台女接线员的声音：“是徐景贤同志吗？北京张春桥同志要找您……”

我打开床灯，看了一下手表：零点十分。哦，已经是元旦了。”全面内战”的一九六七年来

临了！

张春桥在电话的那头着急地说：“上海的赤卫队闹着要乘火车到北京来告状，中央不同意，但是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有一个赤卫队的头头，名字叫王玉玺，他利用职权同意调车，我们知道了都很生气。刚才中央开会研究了，已经由总理直接打电话通知上海市委陈丕显，要他到铁路分局去对王玉玺采取措施。同时，还告诉陈丕显，让他召集各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开一个会，讨论一下怎么把上海的秩序稳定下来。赤卫队几千人上北京的话怎么办呀，还是要‘抓革命，促生产’嘛！不过，现在陈丕显说话可能不灵了，造反派的头头们不肯听他的，所以我打电话给你，你可以在会上说一说中央的精神，做做工作……”

我听完电话，赶快穿衣起床，妻子在一旁埋怨着：“过年也过不安稳，”我说“可能这几天回不了家喽！”几分钟以后，市委办公厅就派小车把我送到了东湖路市委招待所。

不一会儿，各个造反组织的头头络绎不绝地来到了东湖招待所的餐厅：北京和外地的几个著名的红卫兵组织驻沪联络站的负责人，几乎都到齐了，有北大“捍卫团”，有清华“井冈山”，有北航“红旗”，有北京地质学院、体育学院、电影学院，此外，还有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的驻沪红卫兵代表。上海的红卫兵组织有“红革会”、“红三司”、“炮司”、交大“反到底”、同济“东方红”等。“工总司”的王洪文来得比较迟，他穿着一身较旧的黄绿色棉军装，戴着雷锋式的棉军帽，满脸病容，他瓮声瓮气地对我说：“我这几天感冒了，正在发烧。今天开什么会呀？”我便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了他。

最后一个来到会场的是“工总司”二兵团的司令耿金章，他虽然打着“工总司”的旗号；但根本不听王洪文和潘国平的。耿金章披着一件军大衣，足蹬一双高筒皮靴，使他那又瘦又矮的个子显得神气起来。他一阵风似地卷进室内，摆出一副刚从前线归来的指挥官的架势，咋咋呼呼地说：“我刚刚从昆山回来。被我们从康平路打走的赤卫队又集中起来了，他们在北站没有上得了火车，几千人转移到昆山，准备从那儿上火车。我已经把我们二兵团的队伍调去了：把赤卫队堵住在昆山城里……”耿金章小时候生活很苦，被抓壮丁参加了国民党部队，后来又成了“解放”战士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复员到上海才当上了工人。他打过仗，所以现在又用部队的那一套办法去对付赤卫队。大家听到他从昆山带来的消息，马上议论纷纷，对如何处理目前这种混乱的局面，各抒己见。

正当与会者在七嘴八舌的时候，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来了。当时他还兼着上海警备区的第一政委，身穿一身军装，一进门就操着福建口音告诉大家：“我刚才接到总理的电话，总理说：要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做好赴京上访工人的思想工作，交通不能中断，革命的秩序要搞好，总理要我同各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协商，一起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接到电话以后，我赶到上海铁路分局了解情况去了，那个调度所的负责人王玉玺，擅自签字同意发车，破坏交通，我已经按照总理的指示，把他扣押了起来……”

陈丕显边说着边脱下军大衣，然后在白布铺成的长条桌子前面坐下，继续向大家介绍上海当前的严重局势：

……赤卫队要北上告状，现在被阻拦在江苏昆山一带。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的八十多个工作人员中，有七十多人是赤卫队员，都离开了岗位。沪宁线的铁路交通，已经完全中断。从十二月三十日凌晨到现在的二十六个小时中，已经停开客车二十六列，有五万多旅客不能上车，还有五万多旅客被阻在中途，喝水，吃饭都成了问题；停开的货车有三十八列，中途停下的还有二十二列，货物积压了好几万吨。还有最严重的，就是整个上海市只剩一个星期的存粮了。所以，要和大家商量一下，怎么来扭转这个局面？各造反组织的头头们听说了这么严重的情况，

你一言我一语地嚷开了，有的指责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有的要陈丕显自己到昆山去处理问题，还有一个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乘机要陈丕显批条子给他们配备几辆摩托车做联络用。

我一看这个混乱的局面，觉得离开张春桥的电话要求太远了。但是，在这样的时刻假如由我出面帮陈丕显说话，难免有当“保皇派”的嫌疑。情急之中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我走到会场正中，站在陈丕显的对面，大声说：

造反派的战友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把散在昆山和其他地方的几千名赤卫队员弄回厂里去，使沪宁钱铁路畅通，把上海的社会秩序和生产恢复起来。究竟谁应该对这个局面负责呢，就是你，陈丕显！你这个市委第一书记长期躲在幕后指挥，让市长曹荻秋站在前台，你们先是不承认工人造反队，扶植了一支赤卫队，然后又想把赤卫队甩掉。你们才是这次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的罪魁祸首，这笔账我们以后再跟你清算！

接着，我传达了刚才张春桥打给我的电话。大家一听，觉得我的来头不小，便安静下来，“炮司”的几个红卫兵还一字一句地记下张春桥的“中央文革特急来电”，马上出去印发传单了。我顺势出主意说“现在我们这些造反组织，要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出一个联合声明：号召全市群众把矛头对准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欢迎赤卫队反戈一击，回到上海的各个岗位上来，抓革命、促生产。我们还要勒令市委的各级领导干部坚守岗位，听从革命造反派的指挥，维护上海的革命秩序，这个声明写好以后，让陈丕显签字马上送到市委印刷厂去，大量印发。……至于昆山那一边，刚才我已经和‘工总司’王洪文、耿金章同志商量过了，我们立刻赶到那里去，做做赤卫队的工作，动员他们回上海。我们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坚决和各兄弟组织的战友们站在一起，并肩战斗！”

大家同意我的建议，我又逼住陈丕显问道：“陈丕显，你同意不同意？”

在陈丕显表示同意之后，我们当场进行了分工，中央音乐学院驻沪的红卫兵舒泽池、王立平和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的杨小兵愿意执笔起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陈丕显陪在旁边等着签字付印；至于我和王洪文、耿金章等人，带了其他几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立即奔赴昆山。

一切商量完毕，已经晨曦初露，东方微白，东湖招待所的食堂裏端出几笼白馒头，我们吃了几个，便跳上“工总司”二兵团调来的一辆敞篷卡车，向昆山进发……

◇ 张春桥、姚文元飞抵上海

我和几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在昆山活动了一整天，又赶往苏州，最后在城外的一所大庙裏，集中了上千名溃散的赤卫队员。我们和铁路分局打了好久交道，才调来一列客车；大家蜂拥上车，抵达上海的时候，已经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的清晨了。

我回到上海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仔细读了几遍。接着，我到市委机关联络站检查“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的准备工作。这次大会的全部发言稿，由写作班历史组的朱永嘉、吴瑞武负责撰写；大会的一、二、三号通令，由哲学组郭仁杰和上海作家协会的几个人负责撰写；大会的组织工作，由市委党校的程绮华抓总。我强调：各个造反组织的头头只晓得冲冲杀杀，把握不住主攻的方向，连一篇发言稿都拿不出来，只能由我们先做幕后工作；但是，等到开会的时候，大会的主持人、发言人以及宣读向毛主席致敬电和全部通令的人员，要由各个造反组织的头头来担任，因为只有他们能够拉出工人和学生的队伍来。这次大会要正式宣布“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

首的上海市委”，必须有一个大联合的声势，如果光靠我们这些机关造反派，那是孤掌难鸣的。于是，我们在市委党校召开了几次各群众组织的协商会；经过争吵和辩论，最后确定大会在一月六日召开。

正当我们为大会的筹备工作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月三日下午，姚文元忽然又从北京打电话给我，他问道：“武康路二号写作班的地方，现在干什么用？”我回答：“现在成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的内部办公地点，我们对外联络，都在淮海中路市委党校。”姚文元说：“春桥和我想要用武康路二号这个地方，你看行不行？”我一时不太明白：他们要用，怎么用？但我连连回答：“行的，可以的！”我乘机向他汇报了一下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的筹备情况，他不表态，只是说：“这件事我需要和春桥商量一下。”便把电话挂了。

听完电话，我马上找郭仁杰一起分析。郭仁杰原来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教师，总支副书记，调来写作班哲学组以后，仍和复旦的红卫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在推动市委写作班造反的过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现在又成了市委机关联络站的领导核心。我把他看成是我的智囊，凡事都要和他商量。他听说姚文元的电话以后，和我一样感到突然和兴奋，我们研究后一致认为张春桥和姚文元肯定要到上海来了！所以他们要用武康路二号……，但是他们究竟什么时候来，要来多久，来干什么……都还是个谜。

一月四日的上午，我正在武康路二号起草大会的程序，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拎起听筒，姚文元的大嗓门仿佛就在近旁：“徐景贤吗？春桥和我已经到上海了！”呵，想不到有这么快，他们一来，我就有了直接的依靠了，“今天下午，你找几个写作班的核心，等在武康路二号，我们想来听听情况，关于那个大会怎么开，也一起谈一下。关于我们来上海的事，暂时要保密。”

电话通了以后不久，张春桥留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就带了市委警卫处的人员来检查会场了。我安排出写作班楼下东厅，作为他们接见的地点。下午两点多钟，穿着军装、披着军大衣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两个人当时没有担任任何军职，但自从毛泽东穿着军装接见红卫兵以后，所有的中央文革成员都穿起军装来了。

张春桥、姚文元热情地和我、郭仁杰、程绮华、朱永嘉、吴瑞武、王知常等一一握手。大家围着长桌子坐下，张春桥首先开了腔：写作班的造反在上海，在全国的影响都比较大，推动了全国省、市一级的党政机关干部起来造反。最近，中央文革正在起草党政军文化大革命的若干条，里面也吸收了你们的经验。毛主席在接见中央文革的成员时，肯定了你们的造反，文元已经给你们传达过了，所以今天我们想先见见你们……

张春桥说到这里，略有停顿一下，脱下军帽放在桌上，用手抚了一下他那稍带卷曲的头发，慢悠悠地点了一支烟，接着往下说：这次我和文元到上海来，是中央文革派我们来的。我们两个来了当然是和你们站在一起的，联络站就作为我们的工作机构。我们到上海来的任务，是做调查研究，然后向中央报告；所以我们不想介入上海的具体活动，同时，我们到上海来的消息，暂时也不想公开。你们的工作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不必等我们。这时，姚文元插话说：“你们讲一讲最近有些什么动向，那个大会打算什么时候开？”

我当即把“康平路事件”以后的上海形势，作了一个概要的汇报，特别提到自从张春桥打来电话，指出赤卫队已经提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口号，提醒我们不要让别人把胜利果实夺走了之后，联络站就集中全力，准备召开“打倒上海市委”的大会，现在已经准备就绪。接着，我就把大会的名称、发起单位、八个发言的题目和发言人的姓名，三个通令的内容等，统统作了汇报。当我谈到有一个重点发言准备让“工总司”王洪文来讲，内容是“安亭事件”以后市委常委围攻张春桥的情况时，张春桥马上表示出很大的兴趣，他从黄色玳瑁眼镜后面向我投来

好奇的目光，问道：“这个情况你们怎么知道的？”

我回答：“我们翻阅了市委档案室里的档案，这些情况是从当时市委常委会的原始记录中摘出来的。”

张春桥恍然大悟，说：“大会发言稿给我看一下。”

我马上答应：“草稿已经送到报社排印去了，等清样出来以后就送给您审查。”

张春桥点点头。

我又说：“开大会的准备工作经过几个发起单位的讨论，大都取得一致了，我们提出一月六日上午开会，要求陈丕显、曹荻秋和市委常委们都要到场接受批斗，根据气象预报，那天可能有雨雪，所以我们建议大会放在文化广场室内开，‘工总司’提出要拉到人民广场露天去开，我们怕效果不好，所以还没有最后定下来。今天你们两位来了，关于开会的时间、地点，要向你们请示，请你们决定。”

张春桥沉吟了一下，征求了姚文元的意见，然后说：“关于大会的开法和内容，我和文元都没有什么意见，就照你们的安排开。至于会场究竟放在文化广场还是放在人民广场，我们打算明天找‘工总司’的人见见面，到时候听听他们的意见再定吧！”

谈话结束以后，张春桥先走了，姚文元单独留了下来。因为我听说他回到上海后还没有见过家属，所以我和他打了招呼，派人去把他在卢湾区任街道党委书记的妻子金英，接到武康路二号来见面。在这等候的间隙中，我们两人独处，他向我详细询问了市委写作班人员在造反过程中的表现，我一一作了回答。我认识姚文元已经有十多年了，自从他从卢湾区调到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以后又调到《解放》杂志和《解放日报》，我们的交往日益密切。六十年代初期，我写了一篇杂文《不做“冷酷的观众”》，发表以后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姚文元知道以后马上挺身而出，写了一篇杂文《并非“挨批”》，为我作了辩护，我很感激他。以后，他生了肝炎，我当时在市委宣传部工作，就把他的情况向市委写了报告，经过市委批准，让他住院治疗，等他的病基本痊愈以后，再由市卫生局安排，转到青岛去进行疗养。为了答谢我的关心，他送给我一本著作《在前进的道路上》，并在扉页上题句：

蝇死魔走战士在，黝黝夜色听鸡鸣。

姚文元的日常生活很朴素，甚至有些落拓。他常年穿一身蓝卡其中山装，脚上是一双圆口布鞋，肩上挂着一只草绿色的背包，背包里除了书以外，时常可以翻到早上吃剩下的面包等点心。有一次，还拣出过半块油炸粢饭糕。他就以这身装束，到处走动，曾经步行到上海锦江饭店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在大门口就被“挡驾”了：不让进。为此，我为他愤愤不平，因为我也有过类似的遭遇。我曾想：我们这些小人物，一定要在政治上、文学上搞出些名堂来，让那些瞧不起我们的“庞然大物”瞧瞧，争一口气。

此刻，我和刚从北京回来的姚文元两人对坐在武康路二号的东客厅里，听他分析当前阶级斗争的形势。他对这里非常熟悉，就在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日子里，他吃在这里，睡在这里，至今在二楼仍保留着他的写作室。他告诉我：这次回上海张春桥和他都住在兴国路招待所。我知道过去这里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才有资格住的地方。他让我今后通过红色保密电话机和他们直接联系，但是电话号码只能我一个人知道，不要外传。

我把他说的一切都记在小本子上，又抬头凝视着面前的这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朋友：他是过去的姚文元，又不像过去的姚文元，他的一身军装，使我难以和他过去穿的蓝卡其中山装联系起来。他的谈话一如既往，但又略带一点矜持，并且显得颇为小心谨慎。我觉得在他的身上似乎发生了某种变化。但是我又想不管怎么样，姚文元现在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我应该接受他的领导……

◇ “四·一二”炮打张春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发生炮打中央文革张春桥、姚文元的事件。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又发生第二次炮打事件，规模以及卷进去的人数远远超过第一次，第二次炮打主要针对张春桥。

炮打有它的内因和外因。内因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炮打以后，相当多的红卫兵造反派，以“红革会”为代表，被压下去了，这批人心里有气，对张春桥不满。一九六八年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大学后，在学校清查一九六七年炮打的事件，把其中主要的人员作为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隔离起来，比如复旦大学胡守钧，周谷声等。这就引起原来反对过张春桥的红卫兵更大的不满。

外因是，从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到一九六八年年创，全国武斗不断，上海也发生过砸上柴“联司”的事件，江青肯定“文攻武卫”的口号以后，毛泽东在北京派出工、军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他们把学校里两派武斗压下去了，但把原来造反派夺的权也拿回去了，权力到了工、军宣队手里，很大一部分造反派失掉了权力，内心潜伏着很大的不满。中央的政治局势也很动荡，一九六七年八月，武汉事件后，王力煽动夺外交部的权，接着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和冲击外交部事件，中央先后把王力、关锋、戚本禹隔离审查。一九六八年三月份，又出现了“杨、余、傅”事件，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一个是代总参谋长、一个是空军政委、一个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三月二十二日，中央撤销“杨、余、傅”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同时改组军委办事组。二十四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军队系统万人大会，当时中央文革领导人都到会。大会开到最后，毛泽东出现了，后是万人向毛泽东欢呼。

那次大会张春桥正好没有参加，三月二十三日他到南京祝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三月二十四日到杭州祝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他是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去的。三月二十七日中央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誓师大会”。

会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都发表讲话，讲了“杨、余、傅”事件。那次大会，中央也没有通知张春桥参加。

《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艾玲，由于在《海瑞罢官》的批判中收集情况有功，《文汇报》对她很推崇、曾希望她到上海任《文汇报》革命委员会主任，但她家在北京，丈夫贺瑞林是总参二部副部长，她就仍旧留在《文汇报》北办工作。因为上海没有参加“三·二七”会议，不了解中央精神，所以我很紧急地告诉艾玲，让她无论如何到会场，把所有领导讲话做详细纪录，用飞机带回上海，我们派人在机场接，拿到会议纪录，我们要在上海的大会上传达、宣传。三月二十八日，我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召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张春桥也不知道北京其他领导在会上讲话的内容。我们先讨论其他方面的工作，接着就等待北京航班送来的大会讲话纪录。我让我的秘书在机场等，随时与我通电话。那天航班迟到了，我们很着急、秘书拿到文件后，直奔展览馆。文件是艾玲手写的，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北京会场的情况。我向全体委员传达，他们做纪录后就到下面去传达。我传达完马上把这份记录送到张春桥那里，因为只有一份。

◇ 《文汇报》朱锡琪带头炮打

这事情引起了某些人的怀疑。市革命委员会成员、《文汇报》负责人朱锡琪就提出疑问：“中央那么重要的活动，林彪宣布，毛主席到场，揪出一个代总参谋长、一个空军负责人、一个北京卫戍区领导，为什么张春桥没去？”而且上海是这么大的城市，张春桥又是中央文革成员，北京的会议记录竟要徐景贤从《文汇报》北京办事处那里去搞，所以他对此产生了怀疑。

从三月下旬开到四月初，上海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朱锡琪负责筹备工作。朱锡琪在《文汇报》夺权中起了关键作用。上海“一月夺权”和《文汇报》有渊源关系。《文汇报》的夺权，事先没有向张春桥、姚文元请示。但夺权后，受到毛泽东的肯定。《文汇报》是全国报纸中夺权最早的。朱锡琪曾担任《文汇报》报社机要秘书，共产党员，又做过《文汇报》体育专栏记者。当时体育记者很不受重视，但他造反很早，他们有一个三人核心：朱锡琪、邵传烈、周国荣。他们三人在《文汇报》组成一个“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宣布夺权，当天转载了上海革命群众组织的《告上海市人民书》。毛泽东就是看到这一期夺权后的《文汇报》，又看到张、姚给他发去的汇报，一月八日在北京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提到《文汇报》夺权的事情。毛主席说：“过去各省市的造反派，批判报纸宣传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都是采取把报纸封掉的方式，现在《文汇报》造反派宣布夺权以后，宣布自己来办报纸，这种做法很好。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毛主席还说：“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这样一来，朱锡琪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张春桥、姚文元在筹备上海夺权过程中，都叫朱锡琪来参与。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委任朱锡琪担任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组长，同时又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相当于副主任。当时还没有成立市委，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只有十来个人，朱锡琪在当时的地位很高。

朱锡琪平时模样很朴素，背着军用包，留平头，穿蓝布中山装。他喜欢跟人争论，嗓门很大。筹备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张春桥召集过几次小会。当时社会上已经有流言传播，传张春桥是叛徒。有天晚上，张春桥在康平路小礼堂召集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会议，也请各大院校红卫兵代表到会、听听外面的动向。

张春桥在会上问同济大学红卫兵头头陈敢峰：“最近有什么社会动向？”

陈敢峰说：“有人散布谣言，说张春桥是叛徒。”

张春桥听到这消息，脸色阴沉，非常生气地讲“我从来没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啊？”

我听了，心里动了一下，关于张春桥的历史问题，一九六七年的炮打中没有涉及，那时只不过说张春桥是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委烂掉了，难道他是正确的？一九六八年炮打前提到这个问题，我马上联想到他的妻子文静，因为文静曾被捕自首，是不是文静的这段历史传出去后，牵连到张春桥，但我不敢讲。当时也没有人说张春桥是特务。

张春桥在会上还说：“我过去太宽大了，今后要是听到谁再讲这种话，我就不客气了。”他说话的时候，手里还拿着烟，说完，把烟重重地在烟缸里掐掉。然后一字一句地说：“老实说，我只要小指头一点，你就会完蛋！”这话给我的印象非常强烈，从前我看过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报告里说一九四八年南共脱离了情报局，斯大林当面对赫鲁晓夫说：“我只要把小指头一点，就不会再有铁托了，他就要垮台。”后来，我又听过传达，毛泽东曾经说过：“我只要小指头一指，刘少奇就会垮台。”我心想，张春桥把斯大林、毛泽东用过的话在这个场合搬

出来，说明他是非常恨人家提到他的历史问题的。那天，朱锡琪也在。我对张春桥的这段话是相信的：“我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啊？”

这天晚上的会议后，关于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张春桥是叛徒的话还在外面流传。游雪涛小组在外面捕捉动向，发出了警报，认为上海正在酝酿第二次炮打。他发了一期简报，题目是《条顿剑在行动》。当时有一部德国的纪录片叫《条顿剑在行动》，反映法西斯企图复活，纳粹要继续上台的情况。游雪涛引用这部纪录片的名字，意思是形势剑拔弩张，上海又要再一次地炮打张春桥。

但我当时估计不足，认为他们在上海翻不起浪花，所以还是集中注意力搞好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在大会上做了一个全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总结报告，张春桥在大会上也做了一个讲话。

那是一九六八年四月初，会议闭幕时，他上台讲话。那天很特别，他照例先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以后，接着说：“最近的形势大好，北京开了一个粉碎‘二月逆流’的大会，大会揪出杨、余、傅。”他介绍杨、余、傅三人身份的时候，把余立金说成吴法宪，我们都愣住了。吴法宪是林彪非常信任的，军委办事组重要成员，空军司令员，张春桥在讲话时把余立金的名字错说成了吴法宪。

我在下面很着急，向他使眼色，张春桥发现自己讲错了，马上在会上改正，但已经传出去了。大家感到这事出在张春桥身上，好像很不应该。那天讲话结束后，他下来时脸色很尴尬。此事又引起很多人的议论，包括朱锡琪在内。

事情就这样慢慢地积累起来，四月初，上海街头已陆陆续续地出现了大标语：“打倒杨、余、傅，揪出黑后台。”我们理解杨、余、傅的后台可能是指中央的老师，还没有把黑后台想到上海来：当时张春桥的军队职务还不怎么高，最多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我们想，不可能成为代总参谋长等人的“黑后台”。

上海活学活用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开过后，《文汇报》、《解放日报》每天都是几版几版的发讲用稿和消息。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但新华社认为这是地方活动，没有在全国发消息。接着，报纸上出现张春桥到江苏、浙江去参加当地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报道，新华社总社在发稿时，却没有提到他的中央文革副组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头衔，但是在报道其他人如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许世友时，提到他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而对出席祝贺的张春桥，只说他是上海革命委员会主任。

“四·一二”炮打后，我问过张春桥，我说：“你参加江苏、浙江两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时，报道中怎么没有你中央文革和南京军区的两个身份？”张春桥说：“他们新华社记者倒是写上去的，但审稿时让我删掉了，因为中央没有授权我以中央文革的身份去祝贺，我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是以兄弟省市负责人身份去的。”这样，又引起一些人的怀疑。朱锡琪曾问我：“报道中怎么没有写张春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又说，“你看，到现在为止新华社也不发我们上海市积代会的稿子，我要上海新华分社发稿到总社，他们还是没发。”

还有一件事，当时第二军医大学内部有两派，一派“红旗”，另一派“红纵”。“红纵”在上海支持造反派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支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支持上海夺权；“红旗”没有支持。但是“红纵”在北京要打倒邱会作，正好与“红旗”相反，“红旗”是保邱会作，拥护林彪的一派，张春桥和我们比较倾向“红纵”，市革命委员会开全体委员会议，都把“红纵”请来。“红旗”感到疏远他们，对张春桥不满，他们刷出“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的标语，署名是“三军无革派”。朱锡琪在筹备“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与

“红旗”的人接触，他同意“红旗”观点，坚决反对炮打邱会作，邱会作当时是解放军总后负责人，也是林彪心腹。朱锡琪几次表示，市革命委员会不能光与“红纵”联络，也要把“红旗”吸收进来。

四月七日，《北京日报》发表《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的社论，提出“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的口号。朱锡琪要求转载这篇社论，我认为，从林彪讲话和中央几个领导人的讲话中看不出还要揪黑后台的进一步动作，所以我说：“《北京日报》是北京的地方报纸，不是中央的《人民日报》，也不是新华社和《解放军报》，他要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是什么人，不明确，我不同意转载。”这样，朱锡琪对我也很不满意，认为我压制他们捕捉到的新动向。

接着，《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艾玲用保密机给朱锡琪打了一个电话。艾玲说，北京学生也在传说张春桥是叛徒，还说是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用党籍担保张春桥是叛徒。霍士廉曾做过浙江省副省长，后来调任陕西省委书记，当时也已经靠边。这个说法传出来，朱锡琪很相信。艾玲还通过保密机给朱锡琪传来一条很重要的消息，说她丈夫贺瑞林在总参二部能看到中央的传阅文件，中央传阅文件后面附有中央传阅名单，贺瑞林告诉艾玲，这个名单里有姚文元，没有张春桥。这条消息传来，使朱锡琪吃准张春桥有问题。

四月十一日深夜，朱锡琪在《文汇报》开了一个范围极小的会，分析形势，议论的内容是上海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新华社为什么不发报道？《人民日报》为什么几个月不转载上海的社论？北京三月二十七日十万人大会为什么张春桥没有去参加？江苏省、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张春桥为什么没有中央文革副组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头衔？为什么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提出要用党籍担保张春桥是叛徒？为什么上海没有人参加北京“三·二四”、“三·二七”大会？提了好多怀疑，然后议了一个《十个为什么》的传单，署名是“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文人搞炮打，还是有水平的，在传单里没有指名道姓，都是用暗指的方法。所以现在我看见好多人的文章里提到“四·一二”《文汇报》写的传单上公开点名张春桥怎么怎么，这完全不符合当时的事实。他们几个人高明的地方就在这里，连最后提的口号是“誓死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以前的口号都是“誓死保卫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他把“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几个字拿掉了。人家一看，马上会产生一种联想。他们基本上用文字战的办法来写这份传单，署名是“为什么战斗队”。传单写好后，连夜印刷，用很大的字印成大张，到处张贴、散发。四月十二日清晨，我正在睡觉，原来写作组的朱维铮把我叫醒，他已经从墙上揭了一张传单给我。我一看，这明显把矛头指向张春桥。我急忙把传单给张春桥送去，他还没有起床，我叫他秘书来拿，我这里到处告急，八点钟上班时间还没到，很多人已围在外滩市革命委员会大楼前，贴大标语的有很多是穿军装的。他们拿着浆糊桶，从市革会大楼一路贴来，一直到“工总司”（总工会）大楼，穿军装的人贴标语时，把领章、帽徽都拿下来，表示他们不是现役军人。当天，大标语铺天盖地贴了很多。王洪文给我打电话说“我问这些贴标语的人是什么单位的，他们不肯回答。大标语后面的署名都是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我把情况不断地报告给在兴国路的张春桥，他秘书来来回回，一会儿拿标语，一会儿拿外面情况材料，一会儿拿电话记录。

上午九点钟左右，朱锡琪肩上挂着军用背包，晃悠悠地来到康平路院子里，他是来观察动向，看看有什么反映的。我马上把他叫到办公室：“朱锡琪，你搞什么名堂？”

他笑着说：“不要紧张嘛，杨、余、傅的黑后台谁都可以揪的嘛。”

我说：“你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你要揪的是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你跟谁打过招呼了？”我把“为什么战斗队”的传单拿给他看，并说：“你看看，你干了些什么事情？”

他说“我们传单上又没有点名。你看，传单上有什么人的名字吗？没有啊。周总理说过，除了毛主席，谁都可以怀疑。”我吃了一惊，什么时候周总理讲过这种话。朱锡琪很神秘地笑笑，露出两个宽门牙，说“我是从北京红卫兵小报上看到的。写传单，谁都有这个自由嘛。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写呢？”

我说“你还讲自由啊？你究竟还是不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

当天，我给他气得声音都有点发抖，我们两人正在房间里吵的时候，马天水来了，他看到我们两人造反派对造反派，谁也不买谁的账，也不好参加进来。

朱锡琪说“我为什么不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谁也没有资格罢我的官！”声音响得有些嘶哑了。

我说“那好，现在春桥同志还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吧，中央也没有罢他的官，我们没有接到中央通知，你也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你现在跟我到他那里去一次，汇报汇报你们的活动，这总可以吧。”

马天水一听，觉得这是一个办法：“对，我们一起去，把问题谈谈清楚。”我马上拿起电话，直拨兴国路的电话号码，朱锡琪一看急了，他把背包往肩上一送，说：“我不去。”把门拉开就走了。

~~~~~

## 【文革祭坛】

### 千古伤心文字狱——邓拓逝世40年祭

• 袁 鹰 •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廖沫沙挽邓拓诗

—

1966年春夏之交，中国上空狂风呼啸，电闪雷鸣，压得人透不过气来。5月18日凌晨，邓拓含冤离世。那年他五十四岁，正是风华正茂的中年，就成为那场延续十年旷世大灾难的第一位殉难者。

整整一个春天，邓拓的心情都处在惶惑、愤懑以至震撼的状态中。从前一年冬天姚文元那篇批判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刮起的狂风，越来越猛，明显地已经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对着整个思想文化界和北京市委了，不是传来毛泽东主席对北京市委所谓“独立王国”的严厉批评吗？他惶惑不解：北京市委就在中央身边，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怎么可能“水泼不进”？岂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接着，公开点了他的名，拿他的一些杂文随笔开刀，连篇累牍地批判他在《北京晚报》副刊的专栏《燕山夜话》和他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上的专栏《三家村札记》，那种从字里行间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任意上纲、罗织罪名的卑劣手法，使他这个熟谙历史的人很快就想起明清两代那些令人战栗的文字狱。昨天，报上又有一篇戚某的文章，竟无中生有地诬陷他是“叛徒”，更使他热血上涌，头晕目眩。冷静下来，他不禁认真思索：自己历史上两次被捕经过，组织上早已作结论。这个戚某有什么根据将“叛徒”的帽子强加在他头上？工作的错误可以批评，文章的毛病更可以议论，职务也可以免去，但是，人格不能受侮辱，共产党员的尊严不能受侵犯，“士可杀不可

辱”，古往今来许多仁人志士的崇高形象经常屹立在面前。他要用自己的生命维护尊严，留下清白。

这天晚上，他决定给党留下最后一封信。在下笔以前，他先执拗地要妻子丁一岚带着子女先离开家一段时期，说“家里有姐姐照顾我，不要紧”。让心情沉重的妻子先去安睡。然后展纸挥笔，向党倾诉，按自己的认识，认真分析自己被批判文章的背景和不足，不同意那些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诬陷。

……文章的含意究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做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甘心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就在他用生命的最后一息虔诚地山呼万岁的时刻，作为那场大风暴标志的“五一六”通知，正以中央文件名义飞向全国，打开了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文字狱的大门。

十三年后，1979年8月，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决定为“三家村”冤案彻底平反。决定指出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并强加以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种种罪名，完全是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的大冤案，应予全部推倒。决定下达后，全市人心大快，大家表示，一定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决不能再让“四人帮”这类的野心家、阴谋家逞凶肆虐，决不能再让“三家村”这样的冤案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演。（见1979年8月3日《北京日报》。）9月7日，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主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郑重为邓拓平反昭雪。那天，我奉报社领导人之命，起草一副挽联，记得上联是“闽海波涛，长城风雪，三十年笔战生涯，何期奸佞逞凶，千古伤心文字狱”。

文字狱是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统治下的现象。延至当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新的形式、新的手法。邓拓就正好碰到这个枪口上。

## 二

邓拓五十年代在《人民日报》时期的主要助手、前《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胡绩伟，在邓拓逝世二十年时写过一篇《平生赢得豪情在》，开头一段介绍了邓拓的工作和品格：

邓拓同志知识渊博，熟悉社会，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他不是一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指挥者，而是一个亲自动手主持编辑、写作和采访工作的实干家。他领导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对干部循循善诱，平等商讨，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有个时期，报社几乎天天都受批

评，我们常常出大小差错，但他总是主动承担责任，尽量保护干部的积极性。对于来自某些方面的责难和干扰，他常常一人顶着，独自排解；他忍辱负重，胸怀宽广，处之泰然。他体弱多病，仍坚持带病工作，常常通宵达旦。他在战争中腰椎受伤，经常带一个钢架子；他手脚整天出汗，越用脑子，汗流得越多，几乎一个钟头就换一块湿毛巾。真可谓是艰苦奋斗鞠躬尽瘁的典范。在他领导下，报社工作人员如鱼得水，心情舒畅，都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那时《人民日报》的同志同心协力，全心全意办好报纸而努力。《人民日报》的很多同志都认为，这个时期是《人民日报》历史上最令人怀念的欣欣向荣时期。

我就是在那个“最令人怀念的”时期踏进报社大门，迄今已有五十余年了。

1953年元旦才过两天，报社人事科通知我们四个刚从上海《解放日报》调来北京的人，说邓拓同志晚上要同我们谈工作。我们听了有点惊讶，几个普通编辑记者，只须人事科通知到分配的部门报到上班就是，何用总编辑亲自谈话？晚上，不免惴惴不安地走进他的办公室。邓拓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位温文儒雅的学者。他让我们坐下，开口就为年前因工作忙未能在我们到北京第二天就见面表示歉意，接着就用商量的口吻一一征询我们对工作岗位的意见。总编辑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对我这样初到中央机关工作的人，尤其感受到一阵暖意，把窗外的严寒忘得一干二净。这件小事，至今还历历在目，想起当年同时去见总编辑的刘时平、钦本立、顾小岚三位，都已先后去世，不禁凄然。

我分配在文艺部（那时称文艺组）担任编辑，分工主管的副总编是林淡秋。五十年代初报社在王府井大街前《华北日报》旧址，京城的平房大院，各部办公室分散，因而很少见到邓拓，不过常常从一些老同事口中听到对这位总编辑人品、风格和才华的赞美。他肩负重任，辛苦勤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在与报社同事相处中，坦诚恳切，毫无领导架子，即使要公务员、通信员办点事，也总说“请你帮我”如何如何。报社从副总编辑到司机、公务员，一律称他“老邓”，少数刚来的称“邓拓同志”（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末，对领导人都以“老×”或同志相称，从来不称职位）。1954年盖了四层楼，编辑部办公室都集中在楼上，才有机会常见到他。有时在楼梯上相遇，他必定客气地打招呼问好，起初有些年轻同事不好意思，慢慢地也习以为常。有一回还闹过将两位身材矮胖的中年女同志名字弄错的小误会，成为善意的笑谈。

邓拓从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在晋察冀根据地编报纸，但他一直不脱文人本色，具有中国正直学者的品格和本色。他不好虚名，淡泊权位。五十年代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刚成立时，要他担任主席，这本来只是个名义并非实职，但是他认真地一再坚辞，要让具有更多新闻工作经验的老同志担任，后来只是由于中央决定，并以苏联记协主席历来由《真理报》总编辑兼任为例，才定下来。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原来已安排他为中央委员候选人，他得知后一再给中央领导同志打报告，恳切要求换掉他的名字，让给别人。这样的品德和风范，现在哪里还能见到？这是他的品德和素养使然，绝不是故意作秀、矫揉造作。那些年，报社大楼里确实是一片融洽相处、团结和谐的气氛，虽然也有过几次全党全国统一部署的政治运动，但还比较和风细雨，不似后来丁酉“反右派”斗争那样剑拔弩张，伤害同志，这同作为报社最高领导人邓拓的稳重平和有关，老同事们如今回想当年都依然不胜神往。

### 三

就是这样一位忠贞勤恳、鞠躬尽瘁的邓拓，1957年春天猝逢厄运。毛泽东主席忽然大发雷霆，以“按兵不动、不积极贯彻中央精神”为名，当众斥责他“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同中央唱反调”等等，忽而揶揄他是汉元帝，忽而辱骂他“占着茅坑不拉屎”，忽而又鼓动部下造他的反。态度之严峻，措辞之凌厉，确是闻所未闻，也是《人民日报》创刊以来从未遇过的大事。而实际情况只是他对当时所谓“引蛇出洞”的阳谋不甚理解或者不无反感，因而行

动上有所踟蹰，不料竟遭到如此严厉的训斥。一时报社大楼里人心惶惶，仿佛春天里刮来一阵寒风。这位对党对革命从来忠贞不二的老共产党员，为了顾全大局，只得忍气吞声，再三作违心的检讨，并且请求辞职。但未被批准，仅由代表中央主管《人民日报》的胡乔木来报社在一次小型会议上顺便宣布“《人民日报》实行社长制，邓拓同志担任社长，吴冷西同志担任总编辑”。

邓拓虽然处在名义上是社长、却无编报大权的位子上，依然一贯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每天来上班，认真工作。就在社会上响应中共中央开展整风号召到处“大鸣大放”的5月初，给我们副刊拿来一篇杂文《废弃“庸人政治”》，他以某县给农民下命令把全县的棉花在同一天打尖和机关人事工作的官僚主义为例，批评“我们有的同志，不知为什么，天天忙忙碌碌，做出一些大可不必做的事情，他们不管对什么都不肯放手，都要抓，而且抓得死死的”。他说：假若一定要把这些都说成政治的话，那么，这只能说是“庸人政治”。“凡是凭着主观愿望，追求表面好看，贪大喜功，缺乏实际效果的政治活动，在实质上都可以说是‘庸人政治’。这种庸人政治除了让那些真正没出息的庸人自我陶醉以外，到底有什么用处呢？”文字朴素，语气平和，不似那些日子其他杂文慷慨激越、尖锐犀利。可惜在滔滔者天下到处可见庸人、庸官的时代，“一士谔谔”的逆耳忠言，有多少人能听得进去？

这是邓拓给《人民日报》副刊的第一篇杂文。到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困难年代，又写了一篇《从借书谈起》，借清初学者袁枚的《黄生借书说》一文中说到贫寒文士读书之难，皇家和富贵之家藏书无数，“然天子读书者有几？富贵人读书者有几？”从而引出一个真理：占有得多不等于利用得多，许多几乎一无所有的人常是用心最勤的人。“为了优越的条件而自满，而骄傲，结果只能引导到失败。胜利是永远属于那些在困难中不但不低头、反而发愤图强的人们。”

邓拓学识渊博，是位历史学家，对明清以后的历史更有专长，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他说过新闻工作就是治当代史，希望报社编辑记者都应该研究历史，更应该以史为鉴。我自己就曾不止一次受到这种教诲和要求，他说，你不要只关心文艺，更要多读历史，最好能有计划地读完《二十四史》。很惭愧，我虽然对近现代史有兴趣，但从未认真钻研，读书也是兴之所至，胡乱翻阅，到现在也未能完成邓拓同志的要求，深负他的期望。1958年他到我们文艺部来蹲点，用当时的说法是“种试验田”，参加文艺部的工作会议时，很少谈文艺，除了关心杂文外，也不管具体选题，而是鼓励大家博览群书，利用报纸工作的条件，多读书，多充实自己，说这是副刊编辑的起码要求。同时要开阔视野，同各方面人士交朋友，依靠各方面专家办好报纸。勤恳真诚、推心置腹的言谈，文艺部一些老同事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 四

邓拓是杰出的历史学家、新闻家、杂文家、书法家，但我以为他的气质仍是一位诗人。从青少年时代直到去世前几个月，三四十年间写了大量诗词，有的潇洒飘逸，有的浑厚深沉，但都是一往情深，真挚感人。比如当年《晋察冀日报》社有位来自武汉年轻有为的记者司马军城，也是一位有才华的青年诗人。1942年随报社一批同志到冀东工作，在长城以南、滦河两岸游击区办报。邓拓同他情谊很深，在司马去冀东前，曾写诗为他送行，有“山中学道飘青鬓，火里拚金见至情。离乱旅途天野阔，轩昂战纛日边明”之句。1943年，司马军城给邓拓来过一封信。青年诗人从滦水边向西遥望燕山深处，意气风发地写道：“你看，朝晖起处，即我在也。”信到不久，就传来了他在敌人包围中壮烈牺牲的噩耗。邓拓展阅来信，夜不成眠，含泪写了一首挽诗：

朝晖起处君何在？千里王孙去不回。  
塞外征魂心上血，沙场诗骨雪中灰。

鹃啼汉水闻滦水，肠断燕台作吊台。  
莫怨风尘多扰攘，死生继往即开来。

这首挽诗，既有忧伤，又有怀念；既有哀悼，又有誓言；如怨如诉，可歌可泣，通篇都倾注着革命者对战友的深厚情谊，至今读了还是感人至深。

1948年6月，《晋察冀日报》奉命终刊，同晋冀鲁豫边区的党报合并为《人民日报》时，邓拓作为《晋察冀日报》负责人写过一首诗：

毛锥十载写纵横，不尽边疆血火情。  
故国当年危累卵，义旗直北控长城。  
山林肉满胡蹄过，子弟刀环空巷迎。  
战史编成三千页，仰看恒岳共峥嵘。

战争年代，邓拓是党报负责人，十年间“战史编成三千页”，他的诗也都是“昂扬士气，激励民心”的战鼓。即使是写给丁一岚的情诗里，也一样能听到金戈铁马的鼓声和革命战士的心盟：

忆自滹沱河畔游，鹈鹕形影共春秋。  
平生足慰齐眉意，苦志学为孺子牛。  
久历艰危多刚介，自空尘俗倍温柔。  
六年血火情深处，山海风波定白头。

建国以后，他的诗情更如春潮汹涌。大量诗篇，都是忠实地记录党率领人民进军的步伐，记录时代的进程，为新生事物唱赞歌。祖国的山川风物，各行各业的英雄模范，千年文物，一代新人，都进入了他的诗句。报纸工作繁杂，他不大有空暇经常到外地去，但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会让我们读到新作。他好似一位行吟诗人，一路走，一路唱，写的是亲身所见所闻，是人民喜怒哀乐。五六十年代的一些重大决策和措施，现在看来，未必成熟，甚至是走了弯路。但在当时，确实是撼人心魄的。而诗人邓拓，在短暂的旅途上，总是热情洋溢地赞美壮丽的山河和群众的力量，讴歌出土的春苗。诗篇中常常出现普通劳动者和基层干部的名字。他同这些同志素昧平生，但是听到他们的先进事迹，就毫不犹豫地挥动诗笔。

我还记得，1958年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在办公室接到邓拓的电话，他几乎是哽咽着低声说：“黄敬同志去世了，我正在写一首诗，你请收发室来取吧。”收发室同志到他家时，他正好撂下笔。这首同样真挚感人的挽诗，第三天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

千里飞魂入梦惊，寒窗猛忆故人情。  
五台烽火连天壮，四野战歌匝地鸣。  
往事廿年归史传，心香一瓣吊忠贞。  
新潮今日方高涨，革命长征又一程。

这首挽诗，对老战友的哀悼痛惜之情，溢于言表。回顾当年，瞻望未来，又充满了对革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的信心。他怀念战友，也正是为了并肩作战，像几十年来的风雨历程那样，跨上新的征程。如今捧读此诗，不能不沉痛地感到后面几句恰是我们此刻缅怀作者本人的心情。

作为一名文艺编辑，我至今念念不忘的，是他那许多由于报纸宣传需要而写出来的急就章。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一些重要的节日，报纸往往需要组织相应的版面，包括文艺副刊。这类

约稿，时间紧急，常常不容作者反复推敲。因此有些作者视为畏途，也不愿意或不屑于撰写这类诗文。但也有不少作者是满腔热情地、诚心诚意地支持报纸的宣传，乐于写“遵命文学”的。邓拓离开报社去北京市委以后，我们还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有什么要求，写封短简，或者打个电话，一般都是有求必应，按期交稿。元旦或春节的副刊版面，要登一首词，而且最好用《庆春泽》、《东风第一枝》、《春风袅娜》这类不常用的词牌（纯粹因为词牌这个“春”字），按说实在有点违反常情，不符合文艺创作规律。但是邓拓理解我们当副刊编辑的用心，总是欣然命笔。他的这些诗词未必首首都是艺术珍品、不朽杰作，但作者饱满旺盛的政治热情和火热的诗心，是我们经常感动和赞许的，到今天也依然值得大大发扬。急就章必定是粗糙的？未必。邓拓的这些“急就章”大都收在他的选集里，读者和评论家们可以自己来细细鉴评。精雕细刻出来然而苍白无力、缺乏生命力的作品，不也比比皆是吗？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就是对鼓手和歌手的召唤。

## 五

我要以特别浓重的伤感提到邓拓全部诗作中有非常意义、也让报社许多老同事至今难忘的一首诗：《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1959年初，他正式调离报社去北京市委担任书记处书记。2月的一个下午，报社举行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他在讲话时念了一首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他一句一句念着，有的略加解释，如念到第三句时，他说前几天还有位老同志说他“书生意气未能无”，语气间有点自责，也有点自信，却一字不提两三年前那个“书生办报”的斥责。他在台上神态安详，感情真切，一如十年来多次在这讲台上作报告时一样，只是声调中略带着一丝惆怅情味。我们坐在台下，静静地聆听着，却是心事如麻，感慨万千。我反复吟咏、咀嚼这首诗，尤其是“文章满纸书生累”这七个字，感到五味俱陈，这不是一般的应酬诗作，很有点像前人评诗中用过的“深情绵邈，寄托遥深”八个字。

欢送会刚散，报社内部小报《编辑部生活》的编辑就追到二楼邓拓办公室，他立即挥毫把那首诗写下来。两天后，小报登了这首诗，手迹也制了版，好心的编辑还将它印了许多单幅，许多同志将它压在自己办公桌玻璃板下，朝夕相对。几年后，狂飚骤起，大量的污水泼向邓拓的时候，林彪、江青一伙的党羽中有一名刀笔吏不知从哪里看到这首从未公开发表的诗，喜出望外，立即作为重要罪证引入文中，说它通篇都散发“反党情绪”。不少同志含着眼泪把这珍贵的手迹烧掉，也有个别人跟在文痞后边向它吐唾沫，但它却更深地留在许多同志的心头。一想到它，邓拓同志那清癯文雅的书生姿影，就来到我们面前；那略带福建口音的娓娓声调，就响在我们耳边，跟着也就会有一阵揪心的悲痛。

七十年代末，报社从车水马龙的王府井大街搬到东郊金台西路原北京机械学院旧址，是个占地三百亩的大院。办公场所顿时屋敞窗明、阳光充足，社长、总编辑的办公室自然比原来更加宽大。每天在大院树荫下来来去去，我常想要是邓拓活到雨过天晴、全民奋起的新时期，还不到七十岁，每天徜徉在绿树红花的大院里，坐在绿满窗前的书案前，读书撰稿、审阅大样，闲时挥毫泼墨，会平添多少灵感和诗情啊！抚今追昔，大家感慨良多。有些同志建议在编辑楼前草坪上建一块邓拓的诗碑，镌刻他那首《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的诗，老记者陈勇进同志

特别热心，四处张罗，并且具体找到了石料和石工，我也是竭力赞同的。可惜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原因，终于未能实现，实在是件憾事。但是，他的丰碑立在所有《人民日报》老编辑、老记者、老工作人员心里，立在所有熟悉他、热爱他、仰慕他的正直善良的人民心里。2002年3月出版的五大本《邓拓全集》，凝聚了他毕生心血，不正是一块永放光辉的丰碑吗？“文字狱”的教训，更让我们刻骨铭心，那是由邓拓和成千上万忠诚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生命、智慧和才华凝成的啊！

就在那次欢送会的当晚，在报社食堂举行一次小型会餐饯别。尽管他并没有远行，北京市委的办公楼同报社不过一箭之遥，但大家想到他不再能同我们朝夕相处，总是有点依依不舍。我端着酒杯走到他身边敬酒，邓拓从座位上站起来，握住酒杯笑着说：“我不会喝酒，你写一首诗给我吧。”我嘴里答应“好，我一定写”，心里也的确想写，而且步他的原韵，可是一直没有写出来。这一蹉跎就是二十年，二十年后写出来，却成了一首挽诗，再也不可能送到邓拓桌上请他“阅正”了。

血海冤沉不记年，星霜历历付云烟。  
峥嵘气节追高范，锦绣才华迪后贤。  
劲骨遭残宁愿折，蛾眉见嫉敢争先？  
诗魂今日应无憾，泪溢银河注九天。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丁凯文（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